

# 谁偷走了我的音乐备课簿

王崇宁

这件事,成了我心里一道无解的“悬案”,无声地压抑了四十多年。如今,总算能用文字把它倾倒出来。

1981年,我从师范毕业,被分配到池洞镇的岭砥初中点工作,任教初一、初二的数学,兼几个班的音乐。那时改革开放伊始,港台流行歌正热,音乐课是学生特喜爱的科目——谁能精准地唱上几首流行曲,简直自带光环。同事说,此前学校没有正式的音乐老师,上课不过是“捡口水”似的哼几句,音乐课便愈发寡淡。

好在,我们这批师范生都受过正规音乐训练。我虽不专攻于此,却也颇感兴趣,这“重任”便落到了我肩上。

在岭砥工作两年后,我被调到了本镇较为山区的双垌学校工作。这里学生多,听同事说无人教音乐,这门课已荒废多年。此担子,再一次无可推托地交给了我。学校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全部重开音乐课,我每周要上16节音乐,加8节初二数学,共24节课,工作量着实不轻。

我把读师范时的音乐笔记系统地整理出来,工工整整地抄到一本专用的备课簿里:如何练声,倚音、波音、颤音怎么唱,级进音程如何练习……还有当时风靡的《乡间小路》《泉水叮咚响》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《万里长城永不倒》《大地恩情》等等歌曲的曲谱与歌词。这本备课簿,渐渐成了学生们眼里的“宝典”。

或许是因为音乐课缺席太久了,我的歌声在校园里显得格外新鲜。尤其是能教唱流行歌曲,让学生们格外兴奋。只要上音乐课,连最调皮的学生也规规矩矩了。

我特别重视简谱的基础训练,设计了不少练习:三度上下跳、级进三度跳、逐级上下跳、五度逐级跳……孩子们从这些练习开始,慢慢懂得如何练声,摸清音高,学会打拍子,如何先唱谱、再押唱歌词。记得五年级的学生格外热情,课间十分钟,常有一群孩子挤在我那间小小的宿舍门口,迫不及待地问:“老师,这节课音乐课教什么歌?”

有一回,我在黑板上写下一

行陌生的简谱和歌词,对学生说:“这是我自编的一句歌,你们肯定没听过。这次我们先不唱谱,我教‘一二三’,你们直接唱词。”他们瞪大眼睛:“啊?这能行吗?”我笑着点头。口令一出,孩子们竟真的一气呵成,把那首歌词唱了出来——那一刻,他们脸上写满了惊喜与自豪。

可不久后,那本音乐备课簿却不翼而飞了。我独住在学校一间仅几平方米的宿舍,白天门常虚掩,不上锁。真正贵重的东西什么都没少,唯独它不见了。后来,我在每个班都平静地说了一次,不是斥责,而是诚恳地提醒:喜欢音乐是好事,需要什么可以光明正大地向老师借来抄写。用不告而取的方式,或许能暂时拥有一本簿子,却可能模糊了做人的德行,这对个人的品格形成极为不利。

一年光阴匆匆。秋季新学期开学前,学校安排我教初三数学和化学,还要兼大部分班级的音乐。每周依然二十多节课,工作量倒是其次,自掏腰包购买纸墨、用毛笔一张张抄写

“大歌纸”贴在黑板上,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负担——要知道,那时候我每月的工资也不过四十多元。

开学事宜刚刚理顺,一纸调令忽然到来,我离开了双垌,去了别的学校。之后,又几经辗转,直至离开教育战线,步入行政机关工作,直到退休。

人老了,特别怀旧。回顾几十年的职业生涯,最让我回味与牵挂的,依然是那段站在讲台上的日子。如今,我加入了以退休教师为主要群体的“梅岗歌坛”,在歌声中找到了娱乐养老的雅趣。偶尔灵感来了,也试着写写词、谱谱曲,赞美家乡的山水人情。只是每当静下心来时,那个“悬案”总会悄然浮现:到底是谁,悄悄拿走了我那本音乐备课簿?他或她,后来是否因此走进了更广阔的音乐世界?我那本簿子里的字迹和音符,是否曾在某个年轻的生命里,埋下一颗会发芽的音乐种子?

这些,我永远无法知道。但它像一段未完成的旋律,始终在心里低回,温柔,又略带怅然。

# 瓦煲里的冬日

何志坚

粤西的深冬,雨总下得缠绵绵绵,将小城的天空洗成一片朦胧的灰白。这湿冷是能钻进骨头缝里的。记忆里,这样的冬日,厨房总会准时传来洗刷瓦煲的轻响——父亲要给我们做煲仔饭了。他说,这种天气,人的心和胃,都需要一煲结实实实,带着镬气的饭菜来安顿,而且煲仔饭一定要用瓦煲焖,那股热气才不会散。

父亲备料,有种不经意的讲究。米,定是本地的油粘米。他不用量杯,手掌窝起便是最准的容器。“我们广东人吃饭,饭是主角,不能含糊。”他仔细淘米,指尖在清水中拨弄,水要换到清澈见底方罢。而后用清水浸米约半小时,他说这是让米粒喝饱水,煮出来才粒粒分明,芯子透。这看似微不足道的等待,是美味最基础的铺垫。

炉火点燃,蓝色的火苗在瓦煲底跃动。热煲、搵油、下米、加水,动作流畅。待水沸,他便调小火势,静静守在一旁。这是煲仔饭最精微的“火候”之艺。父亲深谙此道:猛火催沸,令米粒翻滚定型;中火收水,让淀粉缓慢糊化,释放甘甜;待到水汽将尽,饭面显出蜂巢般的小孔时,他便将切得薄薄的本地腊肠、腊肉铺陈上去。

那腊味,多是本地人家自制的,或是市上相熟摊档的出品。不似广府腊味那般甜润抢眼,它自有一股咸香质朴的脾气,也不过是简单的盐、糖、少许酒腌渍,倚仗冬日清冽的北风自然风干。父亲说,这腊味有“太阳味”。当然,煲仔饭的天地远不止于此,排骨、滑鸡、黄鳝,乃至饭熟时烫入的几棵碧绿的菜心,都能自成一派风味。但在我们家的冬日,尤其是在父亲手中,腊味永远是那不可动摇的、带着仪式感的开场。当它被置于滚烫的饭面,高温逼出晶莹的油脂,如琥珀色的溪流,潺潺渗入每一粒米饭的缝隙。他有时会再沿着煲边淋一圈花生油,油迅速沿煲壁下滑,与高温相遇,发出轻微的“滋滋”声,这是形成金黄锅巴的关键一笔。

之后,便是“焗”的功夫。父亲将火苗调到极小,或干脆移开明火,利用余热让一切在寂静中慢慢完成。他盖上煲盖,说:“急不来的,要‘焗’一下,味道才肯走到底。”这十分钟的等待,厨房里只有极其缓慢

的“噗噗”声。而那香气却完成了蜕变——从米香、肉香,融合成一种醇厚复杂、无法分割的暖香,丝丝缕缕地漫出来,把厨房的玻璃窗都熏出一层柔和的雾。

香气达到顶峰时,父亲便开始分发。他将滚烫的瓦煲用厚布垫着,一煲一煲地端上桌。我们面前便各自有了一方小小的、喷吐着热气的天地。他说,煲仔饭的魂,一半在锅巴,另一半就在这“煲气”里——离了灶火,也要原煲上桌,那股镬气和温度才聚得住。

开盖的刹那,是冬日里最动人的仪式。蒸汽“轰”地一声奔腾而出,瞬间模糊了眼镜片,温暖了冻得微红的面颊。饭粒油润晶莹,腊味变得半透明,泛着诱人的油光。而最精彩的,永远是各自煲底那层金黄的“饭焦”。父亲会温柔地提醒:“沿着边,用勺子刮。”我们依言而行,勺底与煲壁摩擦,发出清脆连绵的“咔嚓”声,此起彼伏。他笑眯眯地看着,自己并不先吃,待到那此起彼伏的“咔嚓”声欢快地响起来,他眼角的笑意便又深了一些。

一家人围坐,每个人守着自己那一煲乾坤。趁热从边上将饭与腊味轻轻翻起,让腊香的锅巴、油润的肉汁与莹白的米饭在勺中融合。第一口总是烫的,得在嘴里轻轻倒腾两下。但就是这一口,带着锅气的、滚烫的饭落进胃里,像一颗小小的火种被安放了进去。紧接着,一股扎实的暖意便从胃里缓缓晕开,透过四肢百骸,一点点驱散骨头缝里积攒的湿寒。手指尖开始回暖,冻得僵硬的四肢也渐渐复苏。这场景平凡至极,却有一种完整的安宁——每个人都守着自己面前那一小团光与热守护着,从指尖到心头,都是暖的。

如今,旧日那些专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小瓦煲,早已在时光中磕碰磨损,渐渐不见了。但每到深冬湿冷时,我总会不自觉地走向厨房,学着父亲的样子,驯服一炉火,静静地守着一煲饭的成熟。

在这个粤西小城,一煲家常的饭,就这样成了一种抵御寒冬、最质朴也最扎实的方法。它告诉我,真正的温暖并非遥不可及,它就藏在一家人守着那团光热的安静中,在那将满窗冷雾都氤氲成柔光的、笃定的安宁里。

# 怀念大哥

毛勇强

提起大哥,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!

2021年春,疫情期间,有基础病的大哥,在患病几个月后,不幸去世了,享年81岁。天下和大哥同频同道,情同手足,感情笃深。五年来,他的音容笑貌,言行举止,不断地在我的脑海中浮现。每当想起大哥,我往往暗自流泪,不能自己。因此,直到今天才含泪提起笔来写这篇怀念大哥的文章。

大哥出生于1941年,如果不是不幸的命运,曲折的经历,坎坷的人生,大哥的一生也许是另一番天地。

新中国成立时,大哥在化县合江中心小学读书,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州县沙田中学。他天生聪明,才智过人,在班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遗憾的是,由于家里生活拮据,大哥只读完初中一年级便被迫辍学了,回到籍籍江湖公社连界大队圩坡村落户。当时,大队很器重他,安排他当民办教师。后来,他还在林公社任过代课老师,桃李虽然谈不上遍天下,但省内外都有。1965年,他被江湖公社党委看中,被吸收为雇用干部。这期间,他刻苦学习,任劳任怨,工作出色,得到领导的赏识。为此,公社决定吸收他为正式干部,但由于他高度近视,致使转正的愿望落空。

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,还算不幸中的万幸。人有旦夕之祸福。后来,更大的灾难降临到大哥的头上:1978年4月,他和堂弟到广西北流县购买猪苗,不知是由于近视,还是鬼使神差,大哥被火车撞伤了左腿,以致终生残废!值得安慰的是,大哥虽然残废了,但他身残志坚,从不依赖别人,更没有向亲朋好友伸手,而是走自食其力的道路。他干起了修理自行车的营生,还做些小生意,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同时,得到当地

党委、政府的关怀,以及一批亲朋好友的扶持、帮助,加上大嫂的克勤克俭,家庭生活逐渐接近当地的中游水平。前些年,他建起了楼房,娶了媳妇,当了爷爷,儿孙满堂,共享天伦之乐。每当谈起这些,大哥都禁不住热泪盈眶,发自肺腑地感谢政府和关心他的热心人士。

大哥行动不便,极少来探望我。我由于工作太忙,事务比较多,也很少回去看望他。但是,他十分关心我的成长,经常写信鼓励我要努力学习,勤奋工作,遵纪守法,诚实做人,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。后来,大哥家里安装了程控电话,他便很少给我写信了,但经常与我保持电话联系。我喜欢给报刊投稿,大哥便成了我的“忠实读者”。每当我在报刊上发表了稿件,他比我还高兴。为此,他不顾自己生活不算富裕,每年拿出一笔钱,订《南方农村报》和《茂名日报》,以便能及时看到我发表的文章。不仅如此,他还常常打电话给我,鼓励我要不惧艰辛,持之以恒地写作,努力为人民鼓与呼。同时,还不时对我的稿件赞弹一番。由于他当老师时是教语文的,对稿件的优点和不足谈得头头是道,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:大哥不仅身残志坚,乐观做人,还有一颗感恩、善良的心。上世纪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,农村中文盲半文盲比较多,有的人即使读了小学、初中,文字水平依然比较低,连写信都觉得吃力。因此,村中和附近村庄的群众,经常请大哥帮忙代笔,他乐此不疲,用心为大家“服务”。也有本地和外地的干部群众请大哥写投诉信、经验材料和申报材料,他都十分乐意接受,不辞辛劳,夜以继日地操劳,努力交出满意的答卷,而且从来不计较报酬,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!

大哥没有显赫的地位,没有留下丰厚的遗产,没有留下“豪言壮语”。但是,在逆境中保持人格的完整,在困苦中不忘帮助别人,很有尊严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,何尝不是一种难得的成功!

大哥走了,但他脚踏实地、自强不息、乐于助人的精神却留了下来,使我从中看到了爱的力量,看到了坚韧不拔的价值,看到了一个平凡人不平凡的生命轨迹。我心里想:让与世长辞的大哥继续在亲朋好友的灯光中发光,引导后人,激励后人,鼓舞后人——也许这就是最好的怀念。

# 茂名印记

## 信宜县通讯员学习班



上世纪八十年代,信宜县对新闻报道工作高度重视,构建起覆盖广泛的宣传网络——在各机关单位、各公社均配备兼职通讯员,形成“纵到底、横到边”的新闻报道体系。

为提升通讯员队伍专业素质,县里建立常态化培训机制,每年分期分批举办通讯员学习班。培训中,不仅常邀请报社、电台编辑现场授课,传授采写技巧,还组织通讯员开展经验交流,分享写作心得;更会安排实地采访实践,让学员在实践中锤炼能力。其中一次学习班,便组织学员前往高坡公社文垌大队采访,学员们最终撰写《桉树种长出黄麻苗》等14篇稿件,被省报、省电台采用5篇,地市报及电台采用9篇,成果显著,极大激发了通讯员的写稿热情,也提升了其业务水平。

在这支队伍的支撑下,信宜县通讯员每年在各级报刊、电台发稿达几十篇甚至几百篇,有效宣传了县域内的好人好事。年末,县里还会召开全县通讯员总结大会,对表现突出的通讯员进行表彰奖励。这套“培训+实践+激励”的模式,让信宜县新闻报道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,也为推动全县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。

文/图 罗本森

# 难忘的事,难忘的人

陈冲

上世纪六十年代,大众的生活物质普遍匮乏,鱼肉成了餐桌上的奢侈品。也许,有点这方面的原因吧,十岁出头的弟弟陈统,不喜欢上学读书,倒喜欢捉鱼摸虾。夏秋两季,太阳正猛时,他一个人不声不响提个鱼篓子便出去了,在田塍边、在沟渠里捉鱼摸虾。他熟悉那些塘虱、螞蟥往往就藏在田塍边的洞穴里,或沟渠旁的草丛下。弟弟晒得满脸通红,衣服沾满了泥巴。他不觉得苦累,反觉快乐,常常在晌午时笑呵呵地拎回一篓子的鱼虾螞蟥交给母亲,喜得母亲笑逐颜开,夸他吃得苦、能干。

最难忘的是1964年夏天发生的一件事。那日中午,太阳像一炉熔化的钢水悬在空中,大地被炙烤得滚烫热辣,连水田里的小鱼虾也被烫死了。陈统觉得这正是捉鱼的好时机,吃过午饭便冒着酷暑出去了。出门不久,便笑呵呵的拎回了一篓子小鱼小虾,还有螞蟥之类。与往常不同的是,这次捉回的鱼虾螞蟥很多,却全是死的。尽管如此,母亲还是很高兴,晚饭特地为弟妹们煮了一顿干米饭(平时多为稀粥)庆祝,还把鱼虾、螞蟥先用油煎了

一下,再加豆豉、辣姜等佐料放在锅里一起煮,将要出锅时,还洒下一点葱花。哇,那个香哟,溢满了小厨房。守候在一旁的三个弟妹,早已馋得垂涎欲滴,急不可耐。吃饭时,一家人围在一起像过年般开心,三个弟妹撑得肚皮都鼓起来了,还嚷着要吃。

那年,我在公社中心小学读高小,平时食宿都在学校里。可巧那天有特殊情况,晚上回了一趟家。原因是当天考完小学升初巾试,没有了思想包袱,感觉轻松多了,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次日去县城玩,我特地回家向母亲讨几毛零花钱。到家已是撑灯时分,我在学校已吃过晚饭。但母亲说,陈统今日中午捉回不少鱼虾螞蟥,还剩一些在饭桌上,锅里也有些饭,你也吃吧。其时饥饿,学校那点几米饭菜早已不知去向。母亲如此说,正中下怀,于是揭开饭桌上的盖子便吃了起来。久违的鱼虾螞蟥煮得香喷喷,自然是一番狼吞虎咽,剩下的那点子鱼虾螞蟥,一下子便被我吃光了。由于惦记着明儿要上县城,匆匆赶回学校。回到学校,感觉不对劲,头怎么晕乎乎?天气炎热,又是晚

上(那时乡村还没用上电灯),四下无人,便在学校的水井旁洗了个痛快,之后便在井旁矮矮的护墙上睡了一会,起来感觉没那么晕了。

次日一早,一点不晕了,和几个同学说说笑笑跑了两小时山路终于到达了县城。乡下少年,首次进城,感觉一切新鲜好奇。同伴中有位同学的亲戚家就在城里,热情接待,在城里逗留了一宿。第二天一早,便返家了。谁知刚一进家门,便吓了我一大跳,一家人全都躺在床上!

原来,我离开家的那天晚上,约莫半夜时分,一家人突然肚痛,上吐下泻。其时,父亲远在数百公里外的阳江县参加“社教”运动。最大的弟弟陈统才10岁出头,最小的妹妹志英也只有四岁,身为长兄的我又不在家,此时的母亲,心有多急、多无奈、多苦痛!幸得邻居亚金闻声到哭叫声,匆匆赶来,一看知道出大事了,急忙赶到公社卫生院报告。卫生院十分重视,当即派来医生护士带上检测仪器,跟着亚金匆匆赶到我家。经检查,排除了人为投毒,得出的结果是与当晚吃的食物有关。次日调查

又获悉,当日上午邻村生产队肥田时施用化肥“氨水”,在田塍上不慎倾倒了一大罐即刻流入溪中,致使溪中大量鱼虾螞蟥中毒死亡浮在溪面。弟弟陈统正在下游捉鱼,看见这么多鱼虾浮在水面,以为是太阳晒死的,捡了满满的一鱼篓。但他万万没有想到,由此引发了家人的“氨中毒”,差点要了一家人的命。

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,一家人总算逃过了危险。但人还是极度虚弱,还处于半昏迷状态。谁来挑水做饭、谁来刷洗衣物?况且,家里还养了一头母猪带着几个小猪仔。

患难之中,又是邻居亚金伸出援手。次日一早,他又跋山涉水步行三十多里路,多次打听,几经周折,才找到了他从未去过的外婆家。一进家门述说情况,外婆焦急万分,匆匆跟着亚金赶回家。

往事至今,整整六十三个年头了。但这件事一直深深烙在我的脑海中,历久弥新。好人亚金更是令我难忘,感恩不尽。遗憾的是,亚金伯公在十多年前已驾鹤西去。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,愿他的后人安顺。